

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辨正

杨正典

《宋史》卷四百一十八《文天祥传》传中有不实之辞。

德祐初，江上报急，诏天下勤王。天祥捧诏啼泣，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，并结溪峒蛮，使方兴召吉州兵，诸豪杰皆应，有众万人。……天祥性豪华，平生自奉甚厚，声伎满前，至是，痛自贬损，尽以家貲为军费。

在这段叙述里面，就有严重失实的地方。所谓“天祥性豪华，平生自奉甚厚，声伎满前，至是，痛自贬损。”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之词，是元朝以托克托(旧译脱脱)为首的史官们，迎合统治者的意图，所采取的卑劣手法，目的是给文天祥脸上抹黑，歪曲抗元英雄的光辉形象。这也是《宋史》执笔者的阶级立场、民族偏见的反映。这个论断，并非想当然，是有充足的史料作依据的。

公元1275年(宋恭帝德祐元年)初，蒙古侵略军三路南下，襄樊、武汉相继失守，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，惊恐万状，皇帝下罪己诏，号召全国起兵勤王，文天祥在江西任赣州知州，时年四十岁，及时召集地方武装、组织民兵并发动少数民族参军，共一万余人，兼程保卫京畿。文天祥的义举，虽然未能扭

转战局，但意义重大。据史载，文天祥是当时响应勤王号召的第一人。临安沦陷后，文天祥率兵在闽粤之间，寸土血战二年，直至兵败被俘，囚禁四载，坚贞不屈，英勇就义，留下了光耀千古的壮烈诗篇——《正气歌》。文天祥的光辉形象，永远激励着后人。对于这样一位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，元朝统治者抱着什么样的思想感情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据《元史》卷一百三十八列传记载：“至正三年（公元1343年），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。”在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里，明显地反映出执笔者的阶级立场、民族偏见。四次提到元朝统治者忽必烈，都是写作“皇上”、“上”或“世祖皇帝”；六次提到南侵的蒙古军，都是写作“大元兵……。”至于“伐宋”、“破常州”、“入汀州”等词句，这种春秋笔法（“伐”，“入”是针对无道有罪而言的贬词），更是有意识地掩盖侵略行径的手法。《宋史》本传为什么歪曲事实，把文天祥说成是一个在民族危亡的年代，席丰履厚、声色自娱、胸无大志的腐朽官僚，这有其险恶用心和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十三世纪中叶，蒙古侵略军深入腹地，南宋面临危急存亡之秋。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家和具有民族气节的诗人，文天祥从二十四岁（1259年）投身政治活动以来，坚决地站在抗战派的立场，口诛笔伐，跟主张投降、逃跑的奸相阉臣（贾似道、董宋臣等）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。五年之中，两度上书，指陈时弊，抨击朝政，同时从政治上、军事上提出了挽回局势的战略和策略。由于皇帝昏庸，权奸当道，十年之中，他三度被排挤罢官归里。但是，被目为“慷慨敢言之士”的文天祥，却赢得了爱国军民的一致拥戴。

历史事实与《宋史》本传的记述恰恰相反，文天祥始终是一个性格澹泊，自奉俭约、生活朴素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英雄。

先从他的家世说起。他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，父亲是个

没有功名、官职的读书人。文天祥在二十二岁（1257年）写的《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》里说：“……自此名师端友，招聘仍年。至时，先畴给费。久之，室罄，力弗逮，迺率天祥兄弟，藏修于竹居。……竟日夕弗倦，虽贫，浩然自怡，有未见书，辄质衣以市。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十一）连聘请家庭教师，购置书籍的费用，也无力负担，甚至向“质库”（当铺）押衣借贷，这只能算一个小康之家。

文天祥在三十四岁（1269年）罢官归里期间，写给他的老师欧阳巽斋的信中说：“某九月十三日方及门，值乡榜未揭，此一月中，相过者有数，近数日，渐渐增多，来者必数百里或百里，不容不少款。闲居寒薄，殊不能支，而妄有干请者，纷然多不相亮，甚以为苦。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五《与秘书巽斋欧阳先生》）文天祥在京城任职，属卑官小吏，并无积蓄，回家当老百姓，接待远方来客，感到力不从心，可谓两袖清风。

文天祥在自编《纪年录》中，详细记述了他在三十六岁（1271年）罢官隐居家乡文山时的心情与意趣：“予于山水之外，别无嗜好，衣服饮食，但取粗适，不求鲜美。于财利至轻，每有所入，随至随散，不令有余。其天性澹如也，于宦情亦然。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十七）不言而喻，这种淡于名利的情操，安贫固穷的志节，与“豪华”、“自奉”、“声伎”，是格格不入的。

据元朝刘岳申撰《文丞相传》所述：“天祥死，时年四十有七矣。……初，天祥即第，誓不倚势近利，自禄赐所入，尽以散族姻乡友之贫者。至是，官籍其家萧然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附录）。1283年元月，文天祥就义后，元朝官府查抄他的家产，结果毫无所获。这一条记载，《宋史》本传没有。这件史实，是刘岳申根据“乡邦先辈遗老”的闻见所记，对于文天祥的自述“于财利至轻……”，可谓有力的印证。

当文天祥罢官归里隐居文山的时候，心情是沉重的，并且随

时准备出山，为国家效力。他在《生日和谢爱山长句》诗中写道：

“桑弧未了男子事，何能局促甘囚山。……簸扬且听箕张口，丈夫壮气须冲斗。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二）他在《与汪安抚立信》函中说：“某少也驱驰，尝有志事功，鸡鸣奋发，壮怀固在。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六）烽火连天，准备战斗，这就是当年文天祥的处境和决心。文天祥奋起义师抗元，终至杀身成仁，决不是象《宋史》本传所说，是什么幡然悔悟、“痛自贬损”的行动。

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封建时代具有眼光的学者，也是抱着分析的态度读史的。明代胡广（吉水人）在所著《文丞相传》的跋文中说：“广集庐陵先贤传，恒病《宋史·文丞相传》简略失实。盖后来史臣，为当时忌讳，多所删削；又事间有牴牾，乡先生前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，为《丞相传》，比国史为详。……广窃观二传，详略不同，不能无憾，因参互考订，合而为一。芟其繁复，正其讹舛，庶几全备，使人无惑。”（见《文山先生全集》附录）胡广能够发现《宋史·文丞相传》有“失实”、“牴牾”、“讹舛”，这是深有见地的。在他所著的《文丞相传》中，就没有沿用“天祥性豪华……”这一段话。但是，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，作为正史、国史的《宋史》，其影响不可低估。清朝乾隆年间，由毕沅主持编撰的《续资治通鉴》，近世史学家曾予以较高评价。把它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等量齐观，二书合刻，称为《正续资治通鉴》。遗憾的是，在《续资治通鉴》第一百八十一卷，记述1275年二月，文天祥起兵勤王的事迹时，依然人云亦云地沿袭了《宋史》本传的文字：“天祥性豪华……。”

由此可知，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读史论世，才能从繁复、牴牾的史料中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